

跨越回返愛荷華

吳淑慧 ◎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與其說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畫」(The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University of Iowa簡稱IWP)的初衷是無心插柳,毋寧說是一場跨越種族語言與文學的多元民族的對話場域。愛荷華大學被譽為全球四大文學城之一,不僅是培育文學人才的重鎮,更重要的是「國際寫作計畫」的推行,打造了一個自由、開放無國界的寫作象徵。

1936年,韋爾伯·施拉姆在愛荷華大學創立「創意寫作坊」(The University of Iowa Writers' Workshop),宗旨是希望世界各地寫作者以一年的沉潛時間,專注於翻譯與寫作,並授予藝術碩士學位,鼓勵文藝寫作者持續不輟地創作。1941年保羅·安格爾接下主任一職,1966年卸任後,1967年與聶華苓借用「創意寫作坊」精神,成立「國際寫作計畫」,除取得美國國務院的基本資助外,並向企業與文化機構募集資金,讓世界各地創作者有機會在此切磋交流,從此「國際寫作計畫」,成為全球作家匯集,創新文學創意的窗口。至今愛荷華在「創意寫作坊」與「國際寫作計畫」雙軌運行下,對世界文壇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如今「國際寫作計畫」走過了45個年頭,回顧過往,已有來自120個國家1200位創作者造訪過它。當初聶華苓主要是為了提供參與國際寫作計畫的作家,特別是異議份子擁有更自由的寫作與言論空間。而保羅·安格爾則更進一步讓敵對的種族與國家之間建構起對話的橋樑。保羅·安格爾認為:「作家是以語言為媒介的人,他們在愛荷華可以見到他們自己國家見不到的人,比如你在臺灣就不可能見到迦納或印度的作家」。(注1)他還刻意安排臺灣與中國大陸兩個意識型態截然不同的作家在一起對談,在宗教聖戰衝突下的以色列作家與阿拉伯籍作家彼此相互交流。這些在本國本族中相互對立衝突的作家,來到了「國際寫作計畫」,能夠敞開自己的心胸,帶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寬容,開創嶄新的創作觀念,從而改變其寫作心態。

對此,詩人向陽記下了他的觸動:「但我最難忘的,還是在聶華苓大姊家中,我們五位華文作家的『夜會』了。……正確地說,我們政治立場是不同的,但作為文學家,通過文學表現永恆的美的理想是一致的。在聶華苓家中,只要她在,我們總覺得回到了自己的家,她和保羅·安格爾主持『國際寫作計畫』,不僅榮耀了愛荷華大學及其座落的愛荷華市,使得愛荷華市成為世界上第三個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文學之城(另兩個城市是澳大利亞的墨爾本、英國的愛丁堡),同時也使華文作家在美國擁有一個可以依靠的家。」(注2)

根據汪曾祺陳述,以聶華苓為中心的家庭聚會,儼然是二十世紀的文學沙龍,週末作家們齊聚宴會中,以文會友,以酒會文,在聶華苓家不分任何政治背景:「有一次中國作家聚會,合唱了一支歌〈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聶華苓是抗戰後到臺灣的,她會唱相當多這樣的救



亡歌曲。臺灣小說家陳映真、詩人蔣勳，包括年輕的小說家李昂也會唱這支歌。唱得大家心裏酸酸的。聶華苓熱淚盈眶」。(注3)

在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畫」，受邀作家的活動，都是給予充分的自由，而每次的文學沙龍聚集，無非是一次的寫作激盪。誠如姚一葦所言：「我們在此沒有固定的工作，假如有的話，那就是在這段期間內舉行一次作品發表會，宣讀自己的作品和接受別人的批評。我們每週聚會一次，地點多在五月花公寓的大廳中舉行，沒有固定的椅子，你可以坐在地上，甚至躺著，完全沒有形式，非常自由，自由到不來也行。此外的時間，你可以自己支配，讀書、寫作，到外面旅行或訪友，悉聽尊便」。(注4)無可取代的自由色彩，讓第三世界的作家舒展自在的呼吸空間。

這種心靈皈依，是真正吸引作家來到愛荷華的原因。而1979年「國際寫作計畫」的「中國週末」開辦，更是華人作家盛事，當中國大陸與美國建交後，第一次的中國週末是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渡輪度過，來自海峽兩岸三地的華人作家沒有距離，沒有意識型態，不再拘滯當權政府的敵對，反而敞開胸懷彼此交流。保羅·安格爾笑稱是在「馬克吐溫的河流款待馬克思和反馬克思主義的華人」。儘管1981年「中國週末」因經費見絀而停辦，但是在聶華苓家聚會卻不曾停歇。而這些從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返國的作家們，因保羅·安格爾與聶華苓的全球化不分彼此的思維，更加開拓了自我的眼界，通過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地域與種族的文化激盪，幾乎每個參與「國際寫作計畫」的成員，都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

耐人尋味的是，臺灣參與「國際寫作計畫」的作家，是經過聶華苓精心挑選邀請，他們日後影響著臺灣文壇的演變與發展，並且成為文壇舉足輕重的文學健將。從1967年起始，除了早期獲得碩士學位的余光中、葉維廉、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外。1967年直至1970年可說是現代主義盛行的時代，當時聶華苓邀請的幾乎都是現代詩社和創世紀詩社成員。他們強調「拋棄縱的繼承，提倡橫的移植」，認為「詩必須超越時間、空間，思想是大地的飛躍的觀念，企望使自己的作品既能克服寫實主義詩風對事實的過分泥滯」。秉持此一精神，創世紀成員並提出「建立民族詩型之芻議」，朝新民族詩型邁進。當時與會的作家後來在現代詩運動下，引領著臺灣詩體革命。

到了七〇年代邀約的臺灣作家，明顯的文學軌跡是第三次鄉土文學論戰的成員。1977年8月17至19日，彭歌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批評王拓、尉天驄及陳映真三人，強調「文學是個人心靈活動的結晶，不能依公式而創作，更不是因階級成分而劃定品質的產品，」如果「不辨善惡，只講階級，不承認普遍的人性，那裡還有文學？」同月20日，余光中繼之在聯副發表〈狼來了〉，認為臺灣的鄉土文學不應該誤用中國大陸的「工農兵文藝」。在戒嚴時期中，這些根植土地的鄉土文學創作者，如王拓、尉天驄、陳映真，以及宋澤萊，皆在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邀請之列，因為在《自由中國》期間，深受雷震、殷海光、戴杜衡等知識份子風骨影響的聶華苓，深信文學是超越政治性的，在聶華苓心中，沒有任何政治「正確性」問題。

八〇年代，一些在臺灣文壇上仍舊掛上「鄉土文學」的作家，陸陸續續接受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邀請。這時期的作家政治包袱已不似七〇年代沉重，儘管不再有政治迫害的切身之痛，作家嘗試超越政治立場的統獨之爭，嘗試新的寫作技巧，將視野關懷放在弱勢與邊緣的族群們，而這也正是保羅·安格爾的原始初衷，希望通過作家之筆，為受壓迫者發聲。

有意思的是，在八〇年代受邀的作家，中國大陸方面剛好走過文革十年，異議寫作份子也紛紛受邀來到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中。無獨有偶的，八〇年代，臺灣社會各方面也正面臨轉型期，經濟的躍升，文壇面臨了巨大轉型，如文學獎評審機制的誕生、蜂起的文藝創作者、八〇年代現代主義銜接後現代精神、政治氛圍的鬆動，而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讓海峽兩岸三地觸及禁忌話題的作家，成為八〇年代的見證者。

八〇年代作家群相在「國際寫作計畫」中，有著如此鮮明的印記，其背後原因是政治異色。由於聶華苓堅持自由主義精神，半生漂泊海外，對於帶著異議色彩的創作者均給予充分的自由，她自陳：「接觸面廣了，看的人多了，寫作視野變得更廣闊。我不只看中國人的處境，而是人的處境。作家在一起，談的都是人的問題」。

八〇年代末銜接九〇年代到二十世紀初，受邀作家如黃凡、李昂、蕭颯、張大春、駱以軍這些新世代的小說創作者，他們的小說技巧，融合了各類後現代創作精神，拼貼、斷裂、開放，顛覆著過去一元論的單一見解，以作家本身直接介入干預讀者的閱讀行為，瓦解寫實的神話，同時強調語言文字不能完全呈現真相，反省了小說的虛構性與讀者反應。

而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宣告「讀者時代」的來臨，應鳳凰成為新世代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2010年的代表。應鳳凰的文學評論與學者背景，似乎位居小說創作的邊緣，然而在一個強調讀者即一切，應鳳凰為臺灣文壇樹立新的標竿。

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無疑是鳥瞰著臺灣文壇這四十年來的演變，聶華苓的見地與文學嗅覺，貼近著蛻變中的臺灣文壇。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見證著臺灣文壇的歷程，也讓作家們有機會可以讓不容於己的見解可以在這場文學盛宴中泯除疆界，全體共融。

蔣勳回憶當年在愛荷華與聶華苓的相處光景：「文學的書寫是多年後的回憶，生命當下的現場卻永遠歷歷如新，當書寫時，那個現場彷彿又出現在眼前」。聶華苓主導的「國際寫作計畫」是培育臺灣文壇的沃土，造就了眾多努力不輟的創作者，朝向更新更開放的文學視野。

注釋

1. 楊青矗（1986）。不是故鄉的故鄉——訪保羅·安格爾（Paul Eangle）和聶華苓。楊青矗與國際作家對話：愛荷華國際作家縱橫談（頁389）。高雄市：敦理出版社。
2. 向陽（2009年11月）。那些華麗的人生鈴聲——聶華苓。印刻文學生活誌，75期，頁69-73。
3. 汪曾祺（2007年8月）。遙寄愛荷華——懷念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汪曾祺談師友。濟南市：山東畫報出版社。
4. 姚一葦（1995）。戲劇與人生：姚一葦評論集。臺北市：書林出版公司。頁201。